

文史研究论稿

黄志辉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文史研究论稿

黄志辉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文史研究论稿

黄志辉 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高发印务公司排版

广东金海洋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8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 册

ISBN7-5361-1746-9/K·64

定价：8.50 元

序

黄志辉著《文史研究论稿》出版，可喜可贺！

黄志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队伍，扛枪打仗，建国有功；转业到地方，兢兢业业，工作颇有成就，职至县委副书记。按其人品、才学和政绩，本可以继续从政创佳绩，但他不求高官厚禄，却毅然走上高校的育人教坛。在学校一面教书，一面潜志钻研，埋头于古籍文献中，进行古文史钩沉。皓首无倦，积十余年的著述成果，出版数本著作，并在全国性和省市报刊发表论文 70 余篇。现在他为繁荣粤北文化，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中选出 17 篇集成一册，自谦为“论稿”出版面世。

黄志辉同志是位可敬的有专长的学术工作者，也是位对钻研马克思主义用功甚勤，对党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的无产阶级战士。他的著述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尊重前人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尽可能翔实地占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分析，然后或给予正确的说明，或引出新的结论。文章贵实。黄志辉治学严谨，不仅在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离当代久远的问题更注意贯彻这一原则，使所论述的问题平实可信，做到“古为今用”，发挥古代文史研究对今天现实的积极作用。

志辉是粤北连县人，他了解和热爱自己家乡。故“论稿”地方色彩很浓，以研究粤北文史为主线。全书 17 篇论文中，有关粤北方面的就占 11 篇。“论稿”对粤北历史上较有影响的历史重要资料和人物，做了全面的或侧面的论述，对粤北文化史的研究作

出了贡献。

“论稿”虽为论文汇编，但不零散，有一定的系统性。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每部分自成一系列，合起来又成为一个整体。即使单篇论文，也用广采博收的方法，蒐集尽可能多的从古到今的研究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对各家意见，列其要点，进行比较说明，使读者对某一问题既了解这面，也了解那面，既看清眉目，也为看清全貌，一目了然。

“论稿”也是本有创见的著作，书中随处可见著者智慧的闪光。著者不仅在一些较为重大的问题上有某些创见，即使对历史上“陈陈相因”的问题也提出些有新意的看法。在一些领域踏着前人的肩头，向前跨进一步，达到前人尚未达到的认识高度。“文章贵新”，这些认识是极其可贵的，也是对著者多年苦心的酬劳。

我对书中论述的问题多为一知半解，但黄志辉同志嘱我写篇序言，不能推脱，陈述数语，是以为序。

王镛非

1994年7月27日

目 录

“马坝人”的发掘及其史学价值	(1)
韶州在古代岭南开发史上的重要地位	(18)
粤北古代的矿业	(32)
利玛窦在韶州的传教活动述评	(40)
南禅发展大要	(58)
《坛经》引论	(76)
粤北古代知名诗人述略	(92)
岭南诗祖与“清澹”之宗	(100)
杜甫被誉为“诗史”的一个典型范例	
——简论《八哀诗·张公九龄》的历史	
与文学价值	(106)
全面认识杜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115)
太平天国在粤北的革命活动	(137)
余靖在北宋诗歌革新运动中的杰出贡献	(147)
黄庭坚卒年献疑	(155)
桐城文派述评	(163)
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187)
《四库全书》对开拓地方文史研究的重大作用	(196)
《连阳八排风土记》校点手记	(207)
附录：著者论著要目	(216)
后记	(222)

“马坝人”的发掘及其史学价值

“马坝人”(Maba Man)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因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而得名。“马坝人”的发掘与研究,是新中国突出的考古成就之一,在人类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一、“马坝人”的发掘经过

1958年5月,马坝区的农民为了夺取农业丰收,各处调查研究,广辟肥源。因见当地狮子山一个石灰岩洞附近的禾稻长势特好,推测那里的土壤可能含有天然肥料。后来深入洞内挖掘里面的积土,经过化验,含磷的比例高达33%左右。6月间,区党委开办了磷肥加工厂,大量挖取洞中的堆积物。6月底,在这层厚达1米左右的黄褐色粘土中,挖掘出19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内有一个破碎了的人类头骨化石。时值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在那里视察工作,当即指示区党委副书记吴思浪妥加保护。

当年8月21日,广东省博物馆杨岳章受命到狮子岩洞穴调查登记,并将部分动物化石和人类头骨化石带返广州。8月30日至9月2日,省政府派杨岳章、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麦英豪、黎金和中山大学历史系梁钊韬、地理系李见贤等5人,到发现“马坝人”的地点细作调查。后由杨岳章整理写成简报,连同人类头骨化石送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鉴定。9月14日至18日,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商承祚主持下,中国科学院裴文、吴汝康、周明镇3人从北京专程抵韶,会同中山大学梁、

李二人再作复查。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杨岳章、麦英豪、广东省博物馆梁明燊、曾广忆及广东省文化局文物训练班学员 60 余人。

这次复查，重点是在狮子岩内第二层溶洞北边及南边二处试掘。人类头骨化石即发现在洞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裂隙中部，位置是在从入口向西 37.4 米，由隙顶向下 4.1 米处。发现的人头骨，计有头顶骨 3 块，眼眶至前额骨一块（左眶左下缘缺），鼻骨一小块，右蝶连右颞骨一部分。左眉骨及其上方额骨似被动物咬过，有齿伤痕迹。共存的动物化石，有偶蹄类的野猪、牛、鹿，肉食类的虎、熊等。

梁、李二人回校之后，当月就各自向中山大学领导人写了《马坝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和《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两份书面报告。不久，广东省文化局发表了《广东发现第四纪更新世中期人类头骨化石》的简报，刊载在《文物》1959 年第一期；接着，梁、李二人据前述报告编成《马坝人发现地点的调查及人类头骨化石的初步观察》一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59 年第一二期（合刊）；1959 年 6 月和 12 月，广东省博物馆和吴汝康、彭如策先后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一卷第二期与第四期发表了《广东马坝人类及其它动物化石地点调查简报》和《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类型人类化石》二文。1960 年初，贾兰坡再到马坝考查，《南方日报》为此作了报道。于是，“马坝人”的发现，乃得闻名于世。

二、“马坝人”研究综述

“马坝人”头骨化石的发现，迄今 30 余年。对“马坝人”的研究，以“文化大革命”为界，约略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从 1959 年至 1964 年，在《文物》、《中山大学学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南方日报》等报刊，发表了论文和报道 10 余篇，另有著作一种，对“马坝人”的外形特征作了初步鉴定，对其地质年代和发掘意义也作了初步分析。1961 年 10 月，狮子岩被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不久，由于“文革”造成的破坏和阻挠，“马坝人”的研究工作整整中断了 10 年。从 1976 年 10 月至 1988 年 8 月，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人类学学报》和几种研究人类起源和新中国考古成就的专著，以及新编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陆续对“马坝人”的研究作了回顾与总结，并介绍了发掘与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新进展。其中 1978 年出版的《中国古人类论文集》所收入吴新智、张银运《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和发表在 1986 年第二期《人类学学报》上的原思训等人《华南若干旧石器时代地点的铀系年代》等几篇论文，对“马坝人”的断代更为过细，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特别 1988 年 11 月在马坝镇召开纪念“马坝人”头骨化石发现 30 周年学术讨论会，出版了纪念文集，收入与“马坝人”研究有关的论文 15 篇（包括存目一篇），集中了当时研究“马坝人”的最新成果，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为“马坝人”研究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对于“马坝人”的性别、年龄及其所属的类型与地质年代，人们起初从其外形特征及共存动物化石，多方面比较分析。

在“马坝人”刚刚发现时，广东省地志博物馆、中山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将“马坝人”和“北京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细致地进行比较，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人类化石标本”，“初步推测”是“第四纪更新世中期的人类，男性，并可能在猿人阶段的晚期（今称直立人）或古人（今称早期智人）阶段的早期”。^①不过，当时的推测有几种。起初，梁钊韬以为“属于猿人（protoanthropic）或古人（palaeoanthropic）阶段的人类头骨化石”；中山大学地质系方瑞濂认为同出的古脊椎动物群是“属于更新世中期”；后经裴文中和周明镇现场鉴定，则认为“马坝

人”头骨化石与同出的动物化石年代，“均属于中更新世晚期”。至于“马坝人”的类型，裴文中认为“属于古人类型”；吴汝康认为是“由猿人至古人之间的类型，极其量只能属于很早的古人类型”；梁钊韬根据由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复原的“马坝人”头骨化石照片，认为“马坝人”是一“成年的男性”，“应比中国猿人进步”，“比河套人早”，“同样比丁村人早”，“居于猿人和新人（*Neanthropic*，今称晚期智人）之间的形态，并具有尼安得塔类型的特征”，其地质年代“属于更新世中期”。^②

稍后，吴汝康、彭如策对“马坝人”头骨作了更深入的观察，对其外部形态有更详细的描述。他们著文认为，“马坝人”头骨化石虽仅有颅顶盖部分，且已破成数块，但仍可粘接起来。^③主要结论是：“马坝人”是中年以上的男性个体；其头骨外形“介于猿人与尼人之间，与爪哇发现的梭罗人较为相近”；“眉嵴之后的额骨部分，明显收缩，类似猿人”；而“额骨和顶骨的弦弧指数都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可能是早期的古人类型”；其地质年代，“可能是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不久，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进一步考究，把“马坝人”定为“我国早期的古人化石”，“距今二三十万年”。这种看法，从60年代初起，一直延续了多年。

196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银运等人，来到马坝镇清理1958年搬出洞口的与“马坝人”头骨化石同层的堆积物，筛出不少动物化石。只是未及研究，便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停顿。至1984年4月，在曲江县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开发“马坝人”化石出土地点狮子岩，对1964年未清理完的堆积物彻底清查。除又有不少动物化石之外，发现两件砾石打制石器，后还陆续发现了6颗人类的上臼齿。1985年4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邱中郎和许春华，同广东省博物馆宋方义一起，到曲江县进行观察。此

后，对“马坝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科学工作者对“马坝人”出土地层及附近地方的地质、地貌和“马坝人”的外形特征、生活年代、生态环境、活动范围和承传关系等，¹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取得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关于“马坝人”的外形特征，随着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不断增多，学者们研究愈加细致。吴汝康在新著《古人类学》一书，肯定“马坝人”眉脊后方的额骨部分“类似猿人”，而头骨厚度、眼眶上缘和头骨高度、额倾斜度，则分别与尼人“相近”、“相似”或在“尼人的范围之内”，但与西欧的典型尼人又有“明显的不同”。1976年，吴新智与王存义合作，为“马坝人”在《中国古人类》的电影塑造了一个复原像。在“马坝人”头骨化石发现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吴新智又与赵中义合作，根据“马坝人”残存的部分颅盖的矢状与冠状方向的弧线自然延伸趋势，以及其他更多新的资料，将其颅穹与头像重新复原。对“马坝人”外形特征的掌握，就更全面而准确了。

关于“马坝人”的生活年代，由于没有发现与“马坝人”共存的文化遗物，只能根据形态特征来探讨。因为矢状脊是一种原始性的特征，介于直立人与晚期智人之间，属于早期智人，故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判断“马坝人”处于与尼人大体相近的时代。又因50年代一般认为与“马坝人”伴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生活于更新世中期，比欧洲尼人为早，故吴汝康当时认“马坝人”为“早期古人类型”。不过，后来科学工作者发现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一直延续到更新世晚期，而狮子岩又未见任何可作中更新世的代表性动物，故将“马坝人”的生活年代推迟至晚更新世。到1976年10月，吴汝康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中，虽仍说“马坝人”是“早期的古人化石”，而地质年代已单称“可能是更新世晚期之初”，相对年代为“十万年前”。吴新智、张银运在《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一文，则认为“归属更新世晚期更为

恰当”。

由于同“马坝人”头盖骨一起出土的，有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不少学者据此对“马坝人”的生活年代进行推测。据宋方义、张镇洪《马坝人伴生动物群的研究》一文统计，与“马坝人”伴生的哺乳动物群，迄今共发现 27 个种属，可鉴定到种的有 18 种，基本上都是华南地区泛称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其中属中更新世时期和时代较早期的种属占大多数。他们认为：考虑到南方气候变化剧烈程度不如北方，动物群成员更替速度较慢，故“至多也只能作为这一地区中更新世中、晚期的动物群”，“将它作为中更新世晚期末的代表性动物群可能更为合适”。韩德芬在《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动物地理特征的初步探讨》一文则说：华南地区在更新世早期，真正代表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并未占多数；到了更新世中晚至晚期，才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全盛时期，这一动物群的生活范围有所扩大；而真正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南广大地区，则是更新世晚期。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最后鬣狗（*Crocota ultima*）取代了中国鬣狗。因此，与“马坝人”共生的动物群，也应划在更新世晚期。而原思训等人，就正是以最后鬣狗作为测试标本的。李天元在《长阳人与石龙头文化》一文，也认为更新世晚期在中国境内生活的基本上是最后鬣狗，故将“马坝人”的生活年代定在更新世晚期，即旧石器时代中期。许春华、黄志高《马坝人动物群的时代及有关问题的讨论》一文说：“最后鬣狗在中国生存的时间距今为 1—23 万年。也可能表明最后鬣狗在华南出现的时间比华北的要晚，可能在晚更新世之初”。

关于“马坝人”生活的相对年代，原思训、陈铁梅、高世君于 1986 年用铀系法测定了华南一些旧石器地点的年代，其中马坝最后鬣狗有四个数据，最高者为 16.9 ± 1.8 — 1.6 万年，最低者为 12.7 ± 1.1 — 1.0 万年，平均为 14 万年左右，处于中、晚更新世交

界年代，或是中更新世晚期最后一个阶段。吴汝康在《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定在“距今约13万年”。

对于“马坝人”生活的生态环境，上引宋方义、张镇洪《马坝人伴生动物群的研究》一文，在分析“马坝人”伴生动物多数适应潮湿温热环境及其林栖性、广栖性等特点的基础上，推论当时全球性的降温虽已出现，但地处粤北山区中部低纬度的马坝地区，仍然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周围有茂盛的森林和广阔的水域，对人类的生存、发展仍然是非常适宜的环境，并由此判断马坝动物群是一个代表中更新世晚期之末的动物群。吴汝康在《古人类学》一书也说：“与（马坝人）头骨化石伴生的动物化石都是华南更新世洞穴堆积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一些种类，表明当时的气候潮湿而温暖”。这些推断，大体上是合理的。

关于“马坝人”的承传关系，宋方义、张镇洪、黄志高《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新发现的人类化石》一文，鉴于在“马坝人”较晚的地层陆续发现了6颗人类的牙齿化石和一块人类下颌骨化石的残片，初步断定为“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并认为可能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马坝人的后裔”。又说：“自马坝人出现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约可延续到晚更新世后期），陆续存在着人类活动的踪迹，古人类曾长期在这一地区生存、发展”。

1975年，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威廉·豪厄尔斯（W·Howells）来中国访问，并观察了“马坝人”头骨化石。1977年，他为此写了专文，也认为“马坝人”在形态上与尼人十分相似。还说：“如果1950年发现于欧洲，此头骨会被称做‘典型’尼人。”^④

吴新智在《马坝人在人类进化中的位置》一文中则说：“马坝人应属于一种与尼人不同的地区性人种。有比较重要的特征可以将其与尼人分开而归入中国古人类的进化系列。”因为他“保留有中国古人类的一些共同特征，与欧洲的古人类形态上有较明显的不同，同时还有个别特征使人联想到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

流的可能性。”又说：“马坝人”鼻骨的某些特点，亦见于菲律宾巴拉望岛出土的两万余年前的人类化石，“这可能暗示中国与东南亚海岛中的古人类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

据潘其凤、韩康信在《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研究》中指出：对中原仰韶文化居民体质的了解，“总的显示出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类型比较接近的性质，并以接近南亚的程度较大”。又说：“也有人表示大汶口文化居民与现代华南人比较接近”；上海崧泽新石器时代墓葬人骨，亦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征”。^⑤周明镇也认为：发现蓝田猿人头骨化石的陕西蓝田公王岭，出土的动物群化石“最明显的一点是带有强烈的南方动物群的色彩”。^⑥

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对“马坝人”的研究，不仅着眼于进化水平的描述，并开始进行种族类型的探讨，从而确认了“马坝人”在我国人种起源中的地位。

吴新智、张银运在《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一文指出：由于我国时代较早的“元谋人”、“蓝田人”及时代较晚的“马坝人”、“丁村人”都有许多与现代黄种人相似的特征，故而可以把黄种人的历史上溯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时代。吴新智于《马坝人在人类进化中的位置》一文又说：“马坝人是我国古人类一脉相承的进化链条上的一环”。

关于“马坝人”的种族性状，据黄象洪《马坝人的种族特征》一文说：“马坝人头骨的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种族特征是比较明显的。马坝人是据有‘南方’地望的早期智人”。又说：“从元谋猿人以后，一批又一批的先民由南向北迁徙，到达并繁衍于黄河流域，以至整个华北。新石器时代前后，和北亚的先民相遇、混杂，形成我国古代的华夏、东夷等民族。而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则是‘百越杂处’的情景。我国古代种系类型分布的这种状况，大概要到秦汉以后才趋更广泛的融合”。据此，黄象洪认为：我国人

种是“繁衍于北方而来源于南方”。

吴汝康在《中国的人类化石和蒙古人种的起源》一文指出：“从保存有额骨的化石标本来看，蓝田、和县、大荔、马坝和资阳头骨标本都有明显程度不同的矢状脊，只有周口店是例外。保存有部分鼻骨的化石如：蓝田、周口店、营口、大荔、马坝、柳江及山顶洞标本都具有宽阔和较垂直的鼻骨”。这些性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又说：“中国的化石证据表明，蒙古人种的许多性状可以被追溯到直立人，这就说明中国的人类化石和近代中国人群体之间的连续性。这些事实似乎支持种系进化的观点，而不符合迁徙或代替说”。

《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一书，在《半坡氏族考源》一节，也认为“半坡氏族的人们属南方蒙古人种，与中国华南人的体质特征较接近”。又说：“蒙古人种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中亚和东亚干燥草原和半沙漠地带形成，然后向各方发展，遍布辽阔的亚洲地域，包括亚洲北部和西伯利亚、中亚、东亚、东南亚和美洲，又称黄色人种或亚美人种”；“半坡氏族的仰韶文化，可上溯到资阳人、柳江人、长阳人、马坝人、丁村人，甚至蓝田人、北京人，他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直系远祖延续发展的不同环节”。

以上这些研究，大大开拓了“马坝人”的研究领域，同蒙古人、半坡人以及其余同一系列而不同阶段的古人类发展连结起来。

三、“马坝人”的史学价值

人是古猿进化来的。进化的系统，一般认为形成中的人从腊玛古猿到南方古猿，完全形成的人从早期猿人（能人）、晚期猿人（直立人）再到早期智人（古人）和晚期智人（新人），发展到现在的人类。然而，古人类学是历史科学一门十分年青的分支，在

全国解放以前，许多人几乎一无所知。

许立群于1942年在延安编著的《中国史话》，开头仅只提到北京猿人，其地质年代说成“四五十万年甚至是一百万年以前”。1952年出版的张孟闻著《人类从那里来》一书，所介绍的人类化石，仅有爪哇猿人、北京猿人、尼人和克人（1868年在法国克罗马努山洞出土）。其中爪哇猿人的地质年代，说是“在鲜新世与洪积世（Pleistocene）之间，距今约五十万年。这时已进入新生代的第四纪，从此算是进入了人类的世纪。”直到1958年3月出版的李光壁编著的《中国古代史通俗讲话》，介绍我国远古时代的先民时，也仅提及北京猿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特谷，最早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和体骨化石。从此以后的100年间，大多数科学家对尼人持鄙视态度，不承认尼人是现代人的祖先。1859年和1871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接连出版《物种起源》和《人类的起源》二书，指出人类是由猿演变而来，引起很大的争论。1876年，恩格斯发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科学地论证了从猿到人的演化进程，分析了得以实现转变的原因，提出“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的理论，使达尔文的人类起源理论获得唯物主义的新飞跃。不过，在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人类化石可资佐证。经过近百年、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学术界关于人类起源和人类进化的观念，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人类化石最早发现于德国（尼人，1856）、法国（克人，1868）、印尼（爪哇人，1890）等地。在1922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找寻到人类化石，而在南斯拉夫、法国、苏联及巴勒斯坦已迭有发现。（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说：“尽管中国文明的悠久历史早就为人所知，但直到1920年人们还是认为中国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并无人类居住。”摩根的《史前人类》一书就宣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

它的史前史。”

在解放以前，我国发现古人类化石仅有三处：内蒙河套人（1922年），北京猿人（1927年），北京山顶洞人（1933年）。因为有些外国专家认为“北京人”已经灭绝，同我国现代人没有血缘关系；而“河套人”因化石材料零碎，亦未予承认，所以那时实际上仍未找到有说服力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存在的证据。到发现“马坝人”时，尽管我国已有了直立人北京猿人化石，又有晚期智人山顶洞人和资阳人化石，可是早期智人的人体遗物却只有丁村人的3枚牙齿和长阳人的一块残破上颌骨。正因为这样，虽然“马坝人”只保存了一块不完整的颅盖骨和部分面骨，已经十分可贵而格外引人注目了。

“马坝人”的史学价值，首在作为早期智人的代表，介于北京猿人和“丁村人”、“河套人”之间，填补了我国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人类学和我国各阶段人类化石的联结上有重大的意义。早期智人的化石，在西亚和欧、非各地发现较多，且有较完整的头骨化石。但在东亚地区发现很少，且化石多是残缺不全。我国的早期智人化石，都是在建国后出土的。迄今发现的早期智人化石，其地点有丁村、马坝、长阳、桐梓、周口店新洞、许家窑、大荔、巢县、营口金牛山等。从时代上说，最早的是“金牛山人”和“大荔人”，其后是“许家窑人”、“马坝人”、“长阳人”和“丁村人”。“马坝人”头盖骨保存的部分，仅次于“金牛山人”和“大荔人”，而比我国其他早期智人更为完整。因此，就当年发现“马坝人”的时候来说，同仅有的“丁村人”、“长阳人”相较，无疑要重要得多。

“马坝人”的史学价值之二，在于扩大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智人的分布范围，填补了华南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将广东的历史提早到一个远古时代。“马坝人”是广东首次发现的远古人类化石。就当时我国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